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臧克和◎主編

日藏唐代漢字鈔本字形表

第四冊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藏唐代漢字抄本字形表. 第四、五、六册 / 臧克和, 海村
惟一主編. —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7

(日藏唐代漢字抄本字形表)

ISBN 978-7-5675-6521-0

I. ①日… II. ①臧… ②海… III. ①漢字—古文字—字
形—抄本—唐代 IV. ①H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6957号

日藏唐代漢字抄本字形表(第四、五、六册)

主 編 臧克和
策劃編輯 王 熠
項目編輯 張繼紅
裝幀設計 高 山

出版發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 郵編200062
網 址 www.ecnupress.com.cn
電 話 021-60821666 行政傳真 021-62572105
客服電話 021-62865537 門市(郵購)電話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華東師範大學校內先鋒路口
網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盛通時代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 889×1194 16開
印 張 135.25
插 頁 12
字 數 1235千字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
書 號 ISBN 978-7-5675-6521-0/H·917
定 價 998.00元

出版人 王 熠

(如發現本版圖書有印訂質量問題, 請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調換或電話021-62865537聯繫)

項目支持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秦漢六朝字形全譜』項目批號：13&ZD131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十三五』規劃重大項目『漢字文化圈表意文字
主要類型數據庫建設及相關專題調研』項目批號：16JJD740012；

華東師範大學『十三五』『雙一流』學科建設交叉項目

學術顧問：

岡村繁教授（日本）

松丸道雄教授（日本）

濱久雄教授（日本）

劉志基教授（中國）

王元鹿教授（中國）

董蓮池教授（中國）

河永三教授（韓國）

李圭甲教授（韓國）

朴興洙教授（韓國）

阮俊強教授（越南）

丁克順教授（越南）

主編：臧克和（中國）

海村惟一（日本）

副主編：郭瑞（中國）

編輯委員會及分工（按姓氏拼音排列）：

陳秋萍（日文翻譯、文本釋文等）

臧克和（統籌、前言、凡例、審讀）

郭 瑞（語料庫設計加工、字表編排等）

臧其事（技術支持）

海村惟一（版本搜集、文本釋文等）

鄭邵琳（語料庫校對）

海村佳惟（日語翻譯、標注及日語索引、凡例等）

鄭仰甲（語料庫校對）

劉本才（字形對照）

劉 凌（特約責任編輯）

蘭小燕（文字處理）

蘇莉莉（索引編排）

王同芳（文字處理）

王 焰（策劃）

徐敬業（文字處理）

前言

在國家「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等規劃中，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相繼設計開展了《漢字斷代調查與漢字發展史》、《秦漢六朝字形譜》、《中國文字發展史》等課題，幾個重大項目之間具有內在發展的連續性。調研表明，作為書籍形態漢字書寫及傳播，媒介材質與書寫方式關係尤為重要。五代特別是宋代雕版印刷成熟，此前基本依賴手寫傳抄。這裡，也許可以稍稍回顧一下科技文化史上介質技術因素與漢字書體發展的關聯。

從中古紙質媒介與書體發展來看，晉南北朝時期紙張作為書寫介質真正進入廣泛實用階段。考古研究表明，紙張開始並不是作為書寫用途出現的。直到西晉時作為書寫功能還是簡紙並用，東晉以降，便不再出現簡牘文書，而幾乎全是用紙了。經過東漢改進製造技術的紙張，到晉南北朝成為社會用字的主要載體，較之其他書寫載體，極大地拓展了文字書寫的自由空間。只有紙張作為新的書寫載體真正走向社會應用，書家輩出，呈現個性，才真正具備了物質基礎。「洛陽紙貴」之類的成語，也是出現於晉代（語出《晉書·左思傳》）。書寫空間擴展趨向自由，是需要一定物質基礎的。直接的因素，就是紙墨的完備。但用於書寫的紙張，開始也不可能廉價走入尋常百姓之家。晉南北朝書寫者自己就能制造紙墨，則已經見於正史文字。如《南史》卷三十一《張永傳》載：張永「有巧思」，「紙墨皆自營造」，宋文帝「每得永表啟，輒執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了不及也」。而《梁書》卷四十九《袁峻傳》則記載：「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之八世孫也。峻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訥言語，工文辭。」至於南北朝，家貧好學者，沒有力量購書，而卻可以有紙抄寫。這表明紙張作為書寫材料，已經相當普遍了。物質因素具備了，版刻未行，此時還出現了從事書寫的專業戶。《魏書》卷五十五《劉芳傳》載劉芳曾為諸僧備寫經論：「劉芳，字伯文，彭城人也……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尚貞固，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備書，以自資給，夜則讀誦，終夕不寢，至有易衣併日之敝，而澹然自守，不汲汲於榮利，不戚戚於賤貧，乃著《窮通論》以自慰焉。芳常為諸僧備寫經論，筆跡稱善，卷直以一縑，歲中能入百餘匹，如此數十年，賴以頗振。由是與德學大僧，多有還往。」《北史》卷九十載蔣少遊以備書為業：「蔣少遊，樂安博昌人也。魏慕容白曜之平東陽，見俘，入於平城，充平齊戶，後配雲中為兵。性機巧，頗能畫刻。有文思，吟詠之際，時有短篇。遂留寄平城，以備寫書為業。」《梁書·孝行傳》記載沈崇儻備書以養母。《南史·孝義傳》則記載庾震桑父母卒，居貧無以為葬，賃書以營事，至手掌穿，然後葬事獲濟。這種或以書為雇傭的關係，或以書為業解決貧困問題，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書寫需求。基於上述，似可將紙張獲得廣泛使用，作為魏晉南北朝社會文字發展的物質因素來看待。相關紙張介質的普及，促進了楷、行、草等各種書體的完備，書面文學走向全面自覺，才真正具備了基礎條件。^①社會文字使用，講究使用的場合和文字所記錄體裁的配合協調成為可能，才是真正促成魏晉南北朝文體自覺的內在因素和基本條件。南北朝時期，無論是家庭教育還是個人修養，書藝構成「藝能」重要內容，「藝能」為當時以及影響後世的「關鍵字」（見諸南北朝隋唐大量石刻、《顏氏家訓·雜藝》等）。梁啟超著《中國歷史研究法》，就直接從文化工具、著寫傳抄與文史的發展關係著眼進行考察：「世官之制，至漢已革，前此史官專有之智識，今已漸為社會所公

有，此其一也。文化工具日新，著寫傳抄收藏之法皆加便，史料容易搜集，此其二也。遷書既美善，引起學者研究興味，社會靡然向風，此其三也。』梁氏史論，特別揭出著寫傳抄文化工具作為直接的文史發展內因，可謂手眼跳出。

晚唐版刻印刷與書寫，應當放到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加以觀察：唐代社會經濟、文化與教育高度發展，達到中國古代社會鼎盛時期。楷書至此達到最高藝術水準，確定體制範型，調研者或謂之「定型自覺」。同時，也奠定了近現代楷字使用基礎。有唐書法楷則，為後世不易之定制。楷字發展至定型，有其歷史的準備和自身的條件。就文字內部體制而言，南北朝楷書已經臻於成熟，為隋唐楷字定型作了充分準備。從上述物質技術因素來看，兩晉南北朝紙張取代其他介質，對文字書寫空間和傳播速度帶來深刻影響。從唐代當時所提供的條件來看，主要有兩方面社會因素起了直接促進作用：一是承襲隋代科舉教育制度並趨於完備，二是整理形成與此相應的社會標準規範。唐代楷字定型，是唐宋之際文字傳播方式發生革命性轉換的內在因素，也正是唐代楷字規範達到定型化程度，才使得印刷技術通行開來具備了基本前提。技術進步的直接影響，就是使得文字傳播水準不再因人而異。

根據上述關聯，即可發現，現存早期印刷漢字，與共時的石刻書體結構相同、水準一致，因為二者實質上皆屬於唐代手寫體系。調查表明，印刷技術開始時僅僅是漢字成熟個體手寫翻版；印刷初期的技術改進，對當時文字規範所產生的實際影響，主要體現在傳播方式以及後世文字定型體制、文獻傳播水準，不再因人而異。

至於五代印刷與書寫，與晚唐印刷相比，在儒家經典雕印以及佛經類印刷的規模與分工方面有了明顯進步。漢字傳播史上，只有到了五代，纔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唐代定型漢字與最具有能產性和傳播性的技術手段的結合：固定規範，傳播廣泛並形成社會文字標準；延續至今，構成現代漢字體制基礎。

與此同時，文獻至少主體文獻傳播方式不再因人而異，相當程度上個性化的書寫及表現方式，也就與此前六朝隋唐的書家輩出，千岩競秀，流派紛呈，各體書藝，臻於極致，迥乎有別了。定型之後，後世文字整體上也就只是受書家影響的產物。

基於上述因素，唐寫文字，保存為難。日本現存有相當豐富的漢字抄寫本古文獻，其中時間上相當於中國隋唐時期的一批字形清晰的漢字手抄本文獻，日本學者藏家奉為「國寶」，並逐一編號。至於家喻戶曉的日本「遣唐使」，差不多也就是到大唐神聖抄書者的「假名」。明代華亭陳繼儒撰《太平清話》，後來的高麗半島朝鮮人，也有來華訪求書籍的習慣，其「朝鮮人極好讀書」條云：「朝鮮人極好讀書，凡使臣到中土，或限五六十人，或舊典，或新書，稗官小說，在彼所缺者，五六十人日出市中，各寫書目，分頭遇人遍問，不惜重值購回。故彼國反有異書藏本也。」^②基於同樣的關聯，中土由於種種因緣而不傳者，東瀛反有藏本抄本。

字表《一部》「且」字條，下錄初唐《禮記正義》往往作「旦」而中間有丿或、筆相接續，中唐的《翰苑》甚至在「且」形內部加一丿筆；《人部》「但」字條，「旦」符中間，亦有關聯，同歸一揆。這種書寫習慣，方之中土南北朝隋唐石刻用字，皆銜接有序。《、部》「州」字條，著錄中唐《翰苑》依然皆作類似「三刀」形，亦跟南北朝石刻的大量刻寫完全一致。《匚部》「匹」字條，初唐中唐抄本皆從「乚」符書寫，也與南北

朝石刻的大量刻寫同致；「匝」字條，五代抄本仍從「匚」符書寫，亦與南北朝石刻的大量刻寫，結構一揆。《人部》「从」字條，下錄初唐《古文尚書》皆抄作雙刀相並形，與南北朝石刻的大量刻寫完全一致；本部「休」字條，所錄初唐《古文尚書》、《毛詩傳》多加、筆，亦與南北朝石刻不少寫法相同。《人部》「佉」，為梵語譯音用字，見於所抄晚唐《摩訶止觀》本，中土見於經唐人增字的《玉篇》：「佉，去茄切。神名也。」唐代石刻《慧日寺石壁真言》、《佛說彌勒菩薩兜率天下生成佛經碑》、《懷州豎立生台記並經幢》、《常庭訓建尊勝陀羅尼經幢》、《金剛會碑》等。《人部》「作」字條，下錄初唐《古文尚書》等於聲符「乍」其下部分抄為「上」符，至中唐所抄《翰院》等，則或一仍其舊，或從「乍」符。晚唐五代則完全定型為從「乍」結構。《刀部》「切」字條，初唐到五代，所抄字形「七」符皆作「十」符，無例外；中土南北朝石刻所用楷字記號化過程中「七」、「十」開始形成區別，見《王誦墓誌》作「切」，《敬羽高衡造像記》作「切」，《元悛墓誌》作「切」；本部「初」字條，唐抄或從「示」或從「勿」省形；中土南北朝墓誌如《元恪嬪司馬顯姿墓誌》作「初」，《元顯魏墓誌》作「初」，《元誘墓誌》作「初」，《獨孤信墓誌》作「初」。《力部》「功」字條，初唐中唐晚唐所抄皆作「刀」形，至五代始見抄從「力」形；同樣的情形亦見於中土南北朝隋唐五代石刻。《廣部》錄「廢」字條，日藏所抄皆從「疒」結構，而中土漢魏六朝隋唐五代石刻語料庫查詢結果，歷代從「疒」從「疒」兩種結構並行。《穴部》「窺」字條，日藏唐抄皆從「穴」從「視」形；中土南北朝隋唐石刻歷代從「穴」「視」結構，正復常見。《未部》「耕」字條，日抄初唐至五代皆將「未」符抄作「禾」符；中土北魏及唐代石刻，也都見到將「未」符替換為「禾」符的用例。《骨部》「體」字條，日藏初唐所抄《禮記正義》有作「躄」構造者，而晚唐所抄《摩訶止觀》五個字形皆如此作；至於中土《漢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著錄北齊及唐代，僅個別刻石使用「躄」形。鉄——鉄——鉄字組，經過歷時使用，關係錯綜。《玉篇·金部》：「鉄，持桎切。古文鉄。」《名義》：「鉄，池理反。治鏗也。鋸，同上。」《玉篇·糸部》：「鉄，持栗切。縫衣也。又納也，索也。古作鉄。」今所用「鋼鐵」簡化字，適與之構成同形字。字表《金部》「鏃」字條，日存中唐所抄《翰苑》作「鉄」；中土南北朝隋唐石刻用字，北齊《宇文誠墓誌》「松筠雅操，鉄石深衷」作「鏃」，唐代神功元年《張愐墓誌》：「松筠比質，挺標王佐之才；鉄石其聲，獨擅養人之器。」皆確乎以「鉄」為「鐵」之例證。《牀部》「牀」字條，日藏中唐所抄《翰院》使用「床」形；《漢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本部著錄「床」形，亦僅見於唐代石刻。《頁部》「類」字條，日藏所抄中唐《翰苑》字形左旁皆從上下雙犬形，現存《漢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尚未見到類似的寫法。

其餘像著一着、華一花等過渡性結構，也都若合一契。上述用例表明，日藏唐抄系列，與中土各個時段漢字使用及發展情形十分吻合。如此看來，日藏唐抄系列，確乎所來自。

晚清羅振玉、楊守敬前輩學者，極力收拾，像《原本玉篇》，雖殘卷斷紙，不成完帙，吉光片羽，亦不啻連城拱壁，向為學界所重。至於今日，亦復時見多所措意經心者。

顧頡剛、顧廷龍先生編《尚書文字合編》，臧克和上世紀所撰《尚書文字校詁》，即利用其中所著錄日藏抄本資料，允稱便利。^③該系文獻抄寫年代不一，但均源出於唐寫本。《尚書文字合編》曾交待有關抄本情況：岩崎本，岩崎男藏書，殘，日本大正七年（一九一八）影印

本。九條本，九條道秀公舊藏，殘，日本昭和十七年（一九四二）《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影印舊鈔本》第十集影印本。神田本，神田醇容安軒舊藏，殘，日本大正八年（一九一九）《容安軒舊書四種》影印本。島田本，島田翰院藏，殘，一九一四年羅振玉《雲窗叢刻》影印本。內野本，影寫日本元亨二年（一三二二）沙門素慶刻本，全，內野皎亭舊藏，日本昭和十四年（一九四〇）東方文化研究所影印本。上圖本（元亨本）舊本元亨三年（一三二三）藤原長賴手寫本，殘，上海圖書館藏，原件後間有脫佚，據羅振玉《雲窗叢刻》影印楊守敬本配補。觀智院本，日本元亨三年藤原長賴手寫本，殘，東寺觀智院藏，日本影本。古梓堂本，日本元亨三年藤原長賴手寫本，殘，古梓堂文庫舊藏，日本複印本。天理本，日本鎌倉末期寫本，殘，天理圖書館藏，日本複印本。足利本，日本室町時期寫本，全，足利學校遺跡圖書館藏，日本複印本。上圖本（影天正本）舊本影寫天正六年（一五七八）秀圓題記本，全。上圖本（八行本），該日寫本每半頁八行，行大字二十，全本。④

一九九九年，朱葆華教授赴日本下關大學任教，利用課餘時間，訪問東京大學等圖書館，除了複印回來日藏唐寫本《說文·木部》殘卷六紙外，還帶回了空海所撰《篆隸萬象名義》高山寺藏本。此前，中華書局曾影印過該抄本的拼版本。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在高山寺藏本等基礎上，研製了《原本玉篇》、《篆隸萬象名義》等專書對比資料庫。

二〇〇〇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海外珍藏善本叢書，包括周助初先生所輯《唐鈔文選集注匯存》，同樣包含日藏唐抄「國寶」。

二〇一三年，南京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安平秋先生主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宋元本漢籍選刊》十五冊，《日本國會圖書館藏宋元本漢籍選刊》八冊，洵犖犖大者。

二〇一四年在日本九州福岡國際大學召開的世界漢字學會年會第二屆，有些意外的發現。二〇一一年所付梓《漢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雖然初版應急，存在許多問題，還需不斷補正完善，然已在日本漢學界廣泛使用。福岡國際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海村惟一教授，為世界漢字學會理事，系當代日本漢學泰斗岡村繁先生嫡傳高足，宿學高僧，交遊往還者衆，中日兩國學術，能作無間之郵。在他所成功組織舉辦的世界漢字學會第二屆年會上，我們就討論了如何在數字化網絡化時代，使這批珍貴傳抄漢籍漢字原形成為兩國讀者便捷使用的材料。鑒於這批材料類型數量等實際情況，建立了兩國專業學者聯合工作體系。

這些材料根據撰寫內容的來源，可以分為自寫本和他寫本。自寫本，即日本人手抄日本國文獻；他寫本，即中土流傳現存日本的唐抄本及相當於唐代的日本學者（遣唐使等）所抄寫並帶回日本的中國文獻，如《古文尚書》、《禮記正義》、《毛詩正義》、《文選注》、《翰苑》等。還有一批完整字書抄本，諸如唐抄《原本玉篇》、《篆隸萬象名義》，北宋抄《新撰字鏡》等，規模稱大，我們在幾年前也早已作了語料庫深加工處理。至於日本陸續出土的青銅器物銘文、簡牘文等，散在各地，視情況將圖文並收。由於唐抄材料種類繁多且大部零散，除了本次付梓的三冊，初計尚有數冊，文字研究基地將陸續推出其餘若干冊。

唐抄材料經過電腦系統處理，截取原形圖片，存真編排。就內容的唯一性及所呈現的形式而言，該字形譜系列，對於中國諸多學術領域尤其是

漢字發展史，將填補重要缺環（業經基本失落了刻本流行之後的紙質書寫形式記憶）；對於日本漢學界語言文字學界，也將提供便利。基於此，字形表將編製日語中文數種索引，以便世界漢字文化圈地區使用。

首期三冊，第二期三冊，第三期三冊，涉及日本奈良、平安時期的日本漢字抄本文獻用字（相當於中國上自初唐下迄五代）。具體文獻時代屬性及其藏本源流情況，海村教授賞揭示如下：

第一期

(1) 《唐鈔本古文尚書》十三卷，廣橋家舊藏本。其中之一現在的岩崎藏本，殘本，沒避唐太宗「民」字之諱，所書字體為隸古定。（《岩崎文庫貴重書解題一》，東洋文庫，二〇〇四年三月，第八二頁。）最新研究根據載體的紙料、用雌黃訂正文字的手法等，綜合判斷此本是初唐抄本。（國寶《古文尚書》卷第三、卷第五、卷第十二，勉誠出版社，二〇一五年六月，第二五七頁。）

(2) 《翰苑》卷三十，太宰府天滿宮宮司西高辻氏（菅原家）家傳並保持當時卷本裱裝原樣的天下孤本。傳此本出自菅原清公（七七〇—八四二）之手。菅原清公是太宰府天滿宮的祭神「日本學問神」菅原道真（八四五—九〇三）之祖父，遣唐判官。公元八〇四年作為第十八次遣唐使，與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呂，以及最澄、空海一起渡海赴唐，並受到謁見唐德宗的禮遇。其間菅原清公抄此《翰苑》卷三十帶回日本，系平安初期他抄本。（竹內理三《翰苑》，吉川弘文館，一九七七年五月，第一四三—第一五七頁。）

(3) 《摩訶止觀》卷第一，全本。此書是天臺大師智顛（五三八—五九七）於公元五九四年在荊州玉泉寺作的演講，由其弟子灌頂（五六一—六三二）筆錄編輯而成的論書，與《法華玄義》、《法華文句》一起被稱為「天臺三大部」的根本聖教之一。最初由鑒真和尚（六八八—七六三）帶至日本，日本天臺宗開祖最澄（七六七—八二二）抄錄了此本。日後，最澄與圓珍（八一四—八九一）作為遣唐使人唐，又帶回了不少天臺典籍與《摩訶止觀》。據此卷書體以及其他特徵，認定此本為平安中後期抄本。原藏（滋賀）石山寺，後移藏於酒井宇吉氏處，現藏於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日本古寫經善本叢刊第七輯》，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日本古寫經研究所，二〇一四年三月，第九頁。）

(4) 《毛詩》殘本，原藏山城國（現京都市）鳴瀧常樂院，後移藏於和田維四郎氏處。狩野直喜博士向和田維四郎借來影印並分贈海內外學者，大正九年（一九二〇）在還給和田維四郎時，添加了跋文論證了此《毛詩》殘本的學術價值。此後，狩野直喜博士還與敦煌石室發現的《毛詩》殘卷（藏於巴黎國民圖書館）進行校對，通過對兩者的「解觀」、「祛袂末」、「斥取者」等辭彙的考證，確認了兩者是共通的初唐抄本。但就書體而言，此《毛詩》殘本勝於敦煌本。此外，此本與《唐鈔本古文尚書》一樣，在平安時代中期的延喜年間（九〇一—九二二）加上了訓點，是漢籍訓點資料中現存最古老的珍貴資料之一。現藏於岩崎文庫。（《岩崎文庫貴重書解題一》，東洋文庫，二〇〇四年三月，第一頁。）

(5) 《禮記正義》卷第五《曲禮》上、下，僅缺首尾。經文注語只略記首尾，接著施疏，即所謂的單疏本，與孔穎達的原本極其相近。古體字形頗多，就書寫風格而言，當為離唐初不遠的抄本。紙背抄錄的《賢聖略問答》末尾有「天延三年（九七五）五夏月於興福寺喜多院松房記之」云云，這年的書寫者記錄《賢聖略問答》是爲了後學而抄錄的。原藏興福寺，現藏於岩崎文庫。（《岩崎文庫貴重書解題一》，東洋文庫，二〇〇四年三月，

第五頁。)

(6)《十誦律》殘一卷，存第四誦卷第二十二，卷本一軸，姚秦釋弗若多羅、鳩摩羅什所合譯。此本抄於天平十二年（七四〇），是奈良時代初期的他抄（寫經）本。卷末書：『皇后藤原氏光明子奉爲／尊考贈正一位太政大臣府君尊妣贈從一位／橘氏太夫人敬寫一切經論及律莊嚴既了／伏願憑斯勝因奉資冥助永庇菩提之／樹長遊般若之津又願上奉／聖朝恒延福壽下及寮采共盡忠節又／光明子自發誓言弘濟沈淪除煩障妙／窮諸法早契菩提乃至傳燈無窮流／布天下聞名持卷獲福消災一切迷方會／歸覺路／天平十二年五月一日記。』無點。有奈良時代末期的朱筆校正。現藏於岩崎文庫。（《岩崎文庫貴重書解題一》，東洋文庫，二〇〇四年三月，第一頁。）

(7)《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殘一卷，存卷第二百三十『初分難信解品』第三十四之四十九，卷本一軸，唐釋玄奘所譯。此卷有印記『藥師寺印』、『藥師寺金堂』，據此可知此本是天武天皇於六八〇年創建的奈良藥師寺的原裝寫經本，由此可窺奈良時代中期寫經本之一斑。奈良時代中期他抄（寫經）本，無點。原屬（奈良）藥師寺，現藏於岩崎文庫。（《岩崎文庫貴重書解題一》，東洋文庫，二〇〇四年三月，第一頁。）

(8)《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殘一卷，存卷第一百四十四『初分校量功德品』第三十之三十八，卷本一軸，唐釋玄奘所譯。卷末書：『無災殃而不成者般／若之金言真空之妙典被稱諸佛之／父母賢聖之師範也所以至誠奉／大般若經一部六百卷三世大覺十方／賢聖咸共証明我現當之勝必定／成熟貞觀十三年（八七一）（歲次／辛卯）三月三日前上『野』／國大目從六位下安倍朝臣小水麻呂。』平安中期他抄（寫經）本，無點。現藏於岩崎文庫。（《岩崎文庫貴重書解題一》，東洋文庫，二〇〇四年三月，第三頁。）

(9)《諸阿闍梨真言密教部類總錄》是全本，大一帖。日本天臺宗僧安然（八四一？—九一五？）撰。紙帙（高山寺舊藏鎌倉中期寫『借屋圖』製），外題『安然律師八家秘錄全』，朱印『方便智院』。卷末書有『康保二年（九六五）（歲次／乙丑）十一月二日（日次／戊辰）於東塔院寫之已了』（『二日』原脫落，插入一圈在其左傍補書）。另筆在卷末書有識語『仁平四年（一一五四）十月廿日未時交已，東寺沙門弁智法師識』，還有另筆書有『大師（空海）禦作目錄』。桐外箱印票印記有『梧樓私印』、『青木印』。無點。高山寺舊藏，現藏於岩崎文庫。（《岩崎文庫貴重書解題一》，東洋文庫，二〇〇四年三月，第四頁。）

(10)《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蓮花胎藏菩提幢標幟普通真言藏成就瑜伽》三卷，唐釋法全撰。平安時代末期合抄（數人分抄）本，卷本三軸。各卷抄寫者各異，據烏絲欄的樣式，應該是同時期合寫的。原藏寶菩提院，現藏於岩崎文庫。（《岩崎文庫貴重書解題一》，東洋文庫，二〇〇四年三月，第八頁。）

第二期

(1)《春秋經傳集解》，殘存卷第十，卷子一軸，緒紙黃染，高27.2cm，寬57.0cm，卷長1101cm。每紙十五或十七行。本殘卷乃自寫本，抄於保延五年（一一三九）。（《岩崎文庫貴重書解題一》，東洋文庫，二〇〇四年三月，第三頁。）平安時代院政期清原賴業（一一二二—一一八九）襲明經道博士家學後所加的訓點之原本。本殘卷於文字學、訓點學、明經道等領域的學術價值極高。被指定爲國寶，現藏於岩崎文庫。

(2) 《文選集注》殘五卷，存卷第四十八、第五十九、第六十八、第八十七、第一百十三，卷子一軸，楮紙黃染。平安中後期的自寫本。本殘卷的學術價值之高，羅振玉、楊守敬等均有論及。一九五五年被指定為國寶，金澤文庫舊藏。現屬岩崎文庫所有。（《岩崎文庫貴重書解題一》，東洋文庫，二〇〇四年三月，第四頁。）

(3) 《古寫文選》，即島田翰所謂的《文選二卷》（殘卷子本）（島田翰《古文舊書考》，民友社，一九〇五年，第一一四頁。）《文德實錄》：「仁壽元年（八五一）四月，帝喚善繩（善繩，即春澄善繩（七九七—八七〇），平安前期的學者、公卿。《扶桑略記》稱其為「在朝通儒」，不僅通經曉史精文，還精通《周易》、《老子》、《莊子》。在紀傳道方面，繼菅原清公、菅原是善父子之後的文章博士。）講《文選》。」此《文選》即三十卷本。現存二卷，平安初期的自抄本《御堂關白道長公記》：「寬弘三年（一〇〇六）十月二十日，持來《五臣注文選》、《（白氏）文集》等。」《日工集》：「永和四年（一三七八）十二月六日，送《六臣注文選》與京官領武州太守。」據島田翰（島田翰（一八七九—一九一五），字彥禎。明治大正時代的書志學者。）考證：「《文選》之舊本其流傳極多。予所觀尚有數通，然皆非五臣本則六臣本，而單行之書，唯是此書一通而已。是書今所存僅二卷，而依其卷第考之，則蓋為三十卷本。三十卷本者即蕭統之舊也。且無注文，而其所載本文則鑿鑿與李善本符。是其為李善所原之藍帙也可知矣。」島田翰確認此本為「井翁所舊藏，今既歸於海東松方伯插架」。（島田翰《古文舊書考》，民友社，一九〇五年，第一一五頁。）

(4) 《地藏十輪經》現存卷第四、卷第八、卷第九、卷第十。為紙本（黃麻紙）墨書卷子本，高28.0cm，寬54.0cm，每行17字，有墨界，界高21.0cm，界寬2.0cm。卷四紙一七枚，四三三行；卷八紙一七枚，四四三行；卷九紙一六枚，四二五行；卷十紙一五枚，三八九行；均為平安初期的自抄本，並附有元慶七年（八八三）點。《地藏十輪經》是唐代三藏法師玄奘的譯稿。此抄本於佛學、文字學、訓點學都具有極高的價值。現分藏於奈良東大寺和奈良正倉院。（綜合參考中田祝夫《古點本國語學研究》，勉誠社，一九五四年；築島裕《訓點語彙集成》第一卷，汲古書院，二〇〇九年。）

(5) 《法華義疏》局部是飛鳥時代聖德太子的御筆。紙本墨書，高25.1cm，卷長1515.0cm。《法華義疏》是日本書道史之開端、至寶，在佛學、義書學、文字學等領域的學術價值亦無出其右者。《法華義疏》和本系列第三期所收的《伊都內親王願文》同為最典型的御物，《法華義疏》為御物的證據在卷頭。現藏於東京皇居東御園內的三丸尚藏館，此館屬宮內廳所管。（《原色日本美術》二十二卷，小學館，一九七〇年，第四一頁。）

(6) 《金剛場陀羅尼經》（六八六）局部是自寫本中現存最古的寫經。一九五一年六月九日被指定為國寶。曾為市島春城所密藏，後為京都小川家所藏，故亦稱「小川本金剛場陀羅尼經」。二〇〇五年文化廳以五億四〇〇〇萬日幣從個人收藏家手裡購置。（參見《政府調達提供資料016 文部科學省》。）《金剛場陀羅尼經》卷末：「歲次丙戌年五月，川內國志貴評內知識、為七世父母及一切衆生、敬造金剛場陀羅尼經一部、藉此善因往生淨土終成正覺。教化僧寶林」。『丙戌』，即天武天皇十五年（六八六）。

(7) 《大般若經》的局部有二：其一為滋賀縣常明寺所藏，高24.0cm，寬10.4cm；其二為滋賀縣太平寺所藏，高28.3cm，寬8.7cm；均為紙本墨書。調研表明：原為傳入的隋經（他寫本）加入補寫（自寫本）的卷軸，因為翻讀不方便，後改裝成折帖，分藏於滋賀縣甲賀郡土山町太平寺、同町的常明寺、見性庵。太平寺本卷末有「和銅五年（七二二）歲次壬子十一月十五日庚辰竟」。（《原色日本美術》二十二卷，小學館，一九七〇年，第四二頁。）

(8)《雜集》是聖武天皇的宸翰。天平三年(七三一)聖武天皇抄錄與六朝、隋、唐佛教有關的詩文一四五篇。紙(白麻素紙)本墨書,楷書體,每行十八字,有天地橫掛,高27.0cm,全長2135.0cm。卷末有親筆「天平三年九月八日寫了」。聖武天皇三十一歲時抄寫長卷。所抄詩文均為中國所失散之詩文,故作為文字學、文學、佛學等的參照料價值極高。曾載入《國家珍寶賬》卷首。被認定為國寶。現藏於屬宮內廳所管的正倉院。(參考米田雄介《正倉院寶物的歷史與保存》,吉川弘文館,一九九八年。)

(9)《金剛般若經開題》局部為空海(七七二—八三五)親筆所書。是自寫本中之極品。一九五四年三月二〇日被指定為重要文物;一九五五年六月二二日被指定為國寶。曾為高松宮家所藏。考空海《遮照發揮性靈集》卷六可知,弘仁四年(八一三)十月二十五日藤原葛野麻呂書寫《金剛般若經》一八七卷供奉時,寫了此《開題》,即願文。

(10)《七祖像贊》漢字是空海在唐留學時所學的飛白體真跡。絹本墨書掛軸本,高212.7cm,寬150.9cm,被認定為國寶。收藏於京都教王護國寺。(《原色日本美術》二十二卷,小學館,一九七〇年,第四七頁。)

(11)《灌頂曆名》是空海授僧俗於灌頂時的自書備忘錄,開筆於弘仁三年(八一二)十一月十五日,紙本墨書,高28.8cm,全長266.0cm,被認定為國寶。《灌頂曆名》最初納於仁和寺北院經藏,天仁元年(一一〇八)白河上皇把《灌頂曆名》移藏於鳥羽離宮的勝光明院,德治三年(一一三〇)後宇多法皇將其移藏於京都神護寺至今,後宇多法皇還御筆書寫《灌頂曆名》移至神護寺為止的經緯。

(12)《風信帖》是空海於八一二年前後給最澄的親筆尺牘之一,高28.8cm,全長157.9cm,被認定為國寶。現藏於嵯峨天皇下賜空海的京都教王護國寺。四任天臺座主的尊圓親王有「五枚,傳領」記錄,之後有一枚被盜,一枚於天正二十年(一五九二)進獻關白豐臣秀次,卷末有記載。現存三枚(帖),《風信帖》為第一、《忽披帖》為第二、《忽惠帖》為第三。(《原色日本美術》二十二卷,小學館,一九七〇年,第四六頁。)

(13)《書狀》是平安中期儒學詩文大家慶滋保胤(九三四?—一〇〇二)唯一遺留於世的晚年真跡。寬和二年(九八六)剃髮出家,號寂心。《書狀》自署寂心。紙本墨書,高31.2cm,寬54.9cm。被國家指定為重要文物,現藏於東京國立博物館。(《原色日本美術》二十二卷,小學館,一九七〇年,第八四頁。)

第三期

(1)《史記》殘二卷,存《夏本紀第二》(八二五〇字)、《秦本紀第五》(一二七六〇字)。天養二年(一一四五)自抄本(二卷異筆)。紙本墨書卷子本,紙高28.5cm,寬51.0cm,有墨界,界高21.9—22.0cm,一枚二十一行,每行十八—十九字左右,卷本二軸。本文有鎌倉初期的朱筆古記傳點和鎌倉初期的墨筆返點、片假名、四聲點,以及南北朝時代的另外的墨筆點。還有「高山寺」印記。鎌倉中期《高山寺聖教目錄(建長目錄)》裡有「第九十六乙箱史記十二卷,史記十卷不具」的記載。《史記》殘二卷在文字學史、漢學史、史學、訓點學等領域的價值極大。被指定為國寶。高山寺舊藏,現藏於岩崎文庫。(《岩崎文庫貴重書解題1》,東洋文庫,二〇〇四年三月,第七二頁。)

(2)《大唐西域記》,序、卷第一、卷第三、卷第四、卷第五、卷第七,為紙本(楮紙)墨書折本,由卷子本改裝,紙高24.3cm,有墨界,界高

20.0cm，界寬2.0cm，每行十七字左右，序、卷一，五六三行，卷二，五〇七行，卷三，五〇七行，卷四，四五四行，卷五，四八五行，卷六，三七四行。均為平安末期的自抄本，並附有長寬元年（一一六三）點。《大唐西域記》是三藏法師玄奘的旅遊記，沙門辯機撰。此抄本於佛學、文字學、訓點學、史學都具有極高的價值。歸入《石山寺一切經》，現藏於滋賀縣石山寺。（中田祝夫《古點本國語學研究》，勉誠社，一九五四年；築島裕《訓點語彙集成》第一卷，汲古書院，二〇〇九年。）

(3)《香字抄》為紙本（第一紙至第三紙是標紙，第四紙至最後一紙是楮紙）墨書卷子本，紙高28.1cm，寬45.5cm，共四十四枚，每枚有二十至二十二行，每行十五至十七字。為平安末期的自抄本。《香字抄》以博學的視角引用了十二大類一百四十三種書籍的粹粹，書寫了四十六種香名。此抄本於四部各類書籍的考釋校異、漢字字形流變的稽考都有極高的價值。一九五〇年被認定為國家指定重要文物，現藏於杏雨書屋。（岡井慎吾《〈香字抄〉香字抄解說》，貴重圖書影本刊行會，一九三三年；川瀨一馬《增訂古字書研究》，雄松堂出版，一九八六年。）

(4)據一九三六年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等的調查可知：金剛寺一切經本《續高僧傳》開始抄寫於平安後期。紙本墨書卷子本，一紙三十二行，一行十六字。本書收錄卷四（約一一二八〇字）、卷六（約九八四〇字），為天野山金剛寺所收藏。金剛寺為奈良時代行基和尚所建，高野山出身的阿觀和尚於平安時代承安、治承（一一七一—一一八一）在此建立金堂等堂宇。（三好鹿雄《金剛寺一切經全貌》，《宗教研究》，新一三卷六號，一九三六年，第一一六頁。）

(5)法隆寺一切經本《續高僧傳》紙本墨書，卷子裝，一紙二十九行，一行十六—十七字。外題下有『大治二年（一一二七）六月二日經真書寫了』。平安中後期的寫經本。本書收錄卷六（約九八四〇字）乃法隆寺舊藏，現為國立國會圖書館藏。關於法隆寺一切經本《續高僧傳》信息也見於僧林幸於保安三年（一一二二）三月二十三日所記的《法隆寺一切經勸進狀》。

(6)《樂毅論》是光明皇后（七〇一—七六〇）的御書，《國家珍寶賬》所收光明皇后御書兩卷之一，有『天平十六年（七四四）十月三日 藤三娘』的落款。即聖武天皇的光明皇后臨王羲之《樂毅論》的御筆自寫本，被認定為國寶。現藏於奈良正倉院。（參見《原色日本美術》二十二卷，小學館，一九七〇年。）

(7)《敕書》乃天平感寶元年（七四九）閏五月二十日以東大寺為首的十二大寺共同祈禱天下太平時聖武天皇的御筆，《續日本記》有關於此事的記載。此卷《敕書》由靜岡縣榛元郡相良町平田寺所藏，亦稱《平田寺敕書》。紙本墨書，高27.9cm，卷長95.8cm。《敕書》是價值極高的自寫本，被認定為國寶。（《原色日本美術》二十二卷，小學館，一九七〇年，第四六頁。）

(8)《久隔帖》是最澄（七六七—八二二）唯一傳世的真跡尺牘。最澄於弘仁四年（八二三）寫給高雄山寺弟子泰防範並言及空海的尺牘。紙本墨書，高29.4cm，寬55.2cm。由京都青蓮院承傳下來，原富太郎舊藏，現藏於奈良國立博物館。《久隔帖》是價值極高的自寫本，一九三六年五月六日被認定為重要文物，一九五一年六月九日被指定為『書』第十七號國寶。（《原色日本美術》二十二卷，小學館，一九七〇年，第四六頁。）

(9)最澄奉納於延曆寺和止觀院寶物、聖教的目錄裡有六種，而流傳下來的寶物、聖教則和此落款有弘仁二年（八一一）七月十七日的目錄裡所

錄的只有三種而已。就「最澄永納」的落款而言，此卷可謂最澄之真跡。第三期（第七卷至第九卷）所收的《羯磨金剛目錄》是現存最澄真跡中用筆特別不經意的真率而矚目於世的自寫本。紙本墨書，高27.9cm，寬37.0cm。紙面有十多個「比睿寺印」之白文。一九五一年六月九日被指定為「書」第二十三號國寶。現藏於滋賀延曆寺。（《原色日本美術》二十二卷，小學館，一九七〇年，第四六頁。）

(10)《伊都內親王願文》是桓武天皇第八皇女伊都內親王依生母藤原平子遺言，向山階寺東院西堂奉納作為香燈讀經料「墾田十六餘町、莊一處、畠（早田）一丁」時的願文。紙本墨書，高29.6cm，全長340.8cm。紙面有二十五個內親王伊都自押的「朱指印」，卷末的「伊都」也是內親王自署的。卷末的內親王自署便是御物之證據。此卷和本系列第二期所收的《法華義疏》一樣同為最典型的御物，現藏於東京皇居東御園內的三丸尚藏館，此館屬宮內廳所管。按傳統說法寫手是遣唐使橘逸勢（七八二—八四二），即傳橘逸勢所書。橘逸勢與空海、嵯峨天皇同被稱為平安書法三筆。再看此卷既承王羲之韻味，又含唐代書法氣息；竭盡飛動變化之美，展現氣象博大之妙的書作，無人可攀此書道高峰。可惜橘逸勢無真跡傳世以作鑒定之坐標，但當時又無人有此筆力。所謂「傳」可信。（《原色日本美術》二十二卷，小學館，一九七〇年，第八一頁。）

(11)小野道風（八九四—九六四）與藤原佐理（九四四—九九八）、藤原行成（九七二—一〇二八）同被稱為平安書法三跡，小野道風有「野」故稱「野跡」；藤原佐理有「佐」，故稱「佐跡」；藤原行成的官位是權大納言，有「權」，故稱「權跡」。第三期（第七卷至第九卷）所收的《玉泉帖》是小野道風乘輿所書的當時平安時代貴族階層最流行《白氏文集》的白詩，因卷首有「玉泉南澗花奇怪」之句，故名。此帖書體隨興楷、行、草三體縱橫，運筆亦隨興肥瘦、潤渴、大小相交。紙本墨書卷子本，高27.5cm，全長187.6cm。明治十一年（一八七八）近衛家獻上，由此為御物，現藏於東京皇居東御園內的三丸尚藏館，此館屬宮內廳所管。（參考山本信吉《人物叢書 小野道風》，吉川弘文館，二〇一三年；《原色日本美術》二十二卷，小學館，一九七〇年。）

(12)寬平三年（八九一）延曆寺第五代座主圓珍去世時擁有少僧都法眼和尚位，三十六年後的延長五年（九二七）十二月二十七日朝廷為了表彰圓珍身前所建之功，賜其「法印大和尚」之位，諡其「智證大師」之號時宣下《敕書》的副本，即第三期（第七卷至第九卷）所收的《智證大師諡號敕書》。《敕書》為自寫本，文為式部大輔藤原博文所撰，字為中務省內記小野道風所書。紙（藍染麻紙）本墨書卷子本，高28.8cm，全長154.8cm。紙面押有十三顆「天皇御璽」，現藏於東京國立博物館。（參考山本信吉《人物叢書 小野道風》，吉川弘文館，二〇一三年；《原色日本美術》二十二卷，小學館，一九七〇年。）

(13)《秋萩帖》是平安中期的草書代表作，彩箋墨書卷子本，高24.0cm，全長842.4cm。此卷有四十八首和歌和王羲之尺牘臨書二通所構成，紙背有《淮南鴻烈兵略問詰》。被指定為國寶的正式名稱為《秋萩帖／淮南鴻烈兵略問詰（紙背）傳小野道風筆》，現藏於東京國立博物館。（參考山本信吉《人物叢書 小野道風》，吉川弘文館，二〇一三年；《原色日本美術》二十二卷，小學館，一九七〇年。）

(14)「土代」即草稿。延長六年（九二六）十月，三十五歲的小野道風奉敕命在宮中的屏風上書寫大江朝綱（八八六—九五七）所作的律詩八首和絕句三首時的草稿，即第三期（第七卷至第九卷）所收的《屏風土代》。草稿雖然沒有署名，但在卷末有平安末期書法家、書法鑒定大家藤原定

信（一〇八八—？）於保延六年（一一四〇）十月考證書寫了此卷的是三十五歲的小野道風。因是御物，現藏於東京皇居東御園內的三丸尚藏館，此館屬宮內廳所管。（參考山本信吉《人物叢書 小野道風》，吉川弘文館，二〇一三年；《原色日本美術》二十二卷，小學館，一九七〇年。）

該選題屬於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在「十三五」規劃定位中，與出土文字語料庫深加工專題建設及漢字發展史斷代調研相匹配的重大工程之一。從立項到實施，首先是基於著名學者、華東師範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童世駿教授的遠見通識和學術指導。在組織實施規劃過程中，華東師範大學副校長梅兵教授為基地平臺及學科團隊建設花費了不少心血和精力；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董事長、社長王焰女士則直接策劃並全程指導項目進展。這些因緣，也許可以在這裡順便提到。

臧克和 於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

① 臧克和：《書體發展與文體自覺》，《學術月刊》，二〇〇七年第三期。

② 明華亭陳繼儒撰《太平清話》二卷，所見版本為大字本，卷一封面標識為「官板」、「昌平叢書」字樣，卷二末注明「元治甲子春晚讎校 大島文」、「慶應元年刊」，所蓋圖章為「東京松雲堂書店發售」；另外，卷二「天下瀑布皆有聲」條，有眉批云：「京都魚山有無音瀑。」知該本為日人所版。現藏德國波恩大學漢學系圖書館。所記諸條，標點為筆者所加。

③ 臧克和：《尚書文字校詁》，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④ 顧頡剛、顧廷龍：《尚書文字合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